

简论《战国策》之游侠

时兰兰

(甘肃省博物馆,甘肃 兰州 730050)

[摘要]《战国策》是我国战国时期弥足珍贵的一部史料汇编,其中介绍了许多可爱的游侠,他们行侠仗义、自由潇洒、游走四方。同时,又有其悲凉的一面。他们以自身标准、个人的恩怨来决定自己的行动,正直勇敢,行为上往往表现出过激、单纯而真挚的一面;默默隐忍又蓬勃反抗,内心的孤独和面对世态的无能为力造就了他们特殊的性格,开辟了除入仕、归隐之外的第三条路——游侠。他们以个人力量自下而上地进行反抗,成为《战国策》中特殊的一类,深受人们的喜爱。

[关键词]游侠;《战国策》;荆轲;聂政;豫让

[中图分类号]K231.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2)04-0071-03

一提到“侠”,许多人会想到金庸、古龙,还有他们笔下的一个个传奇——或是勇猛无畏,武艺高强,浪迹天涯;或是豪气冲天,抱打不平,仗义疏财;或是惩恶扬善,嫉恶如仇,视死如归;或是知恩图报,说一不二,执著不悔;或是托身白刃,杀人红尘,浑身是胆……“侠”以其独具的魅力吸引着千万中华儿女。本文主要借《战国策》来简论游侠。

一、游侠概说

游侠,先说“侠”。战国时代,战乱纷起,周室衰微,诸侯争锋,对于人才的需要日益强烈。这时的养士成为一个政治集团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因素。“士”字作斧形,本指武士;文士则称“君子”,“君”以手执笔,代口而书也,这是分开来讲的,后来,“士君子”合称,则渐不分也。据《说文解字》,“侠”、“俌”互训,前字从“夹”得声,后字从“粵”得声。据“右文说”、“纲目说”,形声字声旁兼义,“夹”为一大人挟二小人,“粵”下示气出有碍,上示田间有路。综合而训之,则侠当指劫挟别人,为受屈者解难除碍之人也。可见,侠虽代人伸张正义,但被视为不合礼法,为正当的目的不择手段,也就是韩非子所谓“侠以武犯禁”之意。这样,儒家、法家皆不容“侠”。儒为温和的社会中心主义,法为严厉的社会中心主义。而道家既然脱离社会主体,那么“侠”便充当了社会中心主义的减压阀,以其自由的精神和意志。从某种意义上说,“侠”可以为社会提供一种调适剂或润滑油。

再说“游”。战国时代的武侠本身没有自己的土地,也谈不上什么钱财,他们走南闯北,不固定地做门客,独自行动。可谓无组织、无纪律,孤独中带几分神秘,郁闷中含几分潇洒,因为这份自由,所以称“游”。值得一提的是,在当时,“游”不只是侠的专属,当时的“士”也善游,“跳槽”成为时尚,人才的大量流动不单单是个人的行为,更是时代情势使然。那时国与国之间,讲的是以势相争,以智谋

相夺,那些活跃于政治舞台的士人们,也多以自己的才智向合适的君王换取功名利禄,朝秦暮楚,四处游走,倒也不足为奇。

二、《战国策》与游侠

《战国策》是我国战国时期弥足珍贵的一部史料汇编,也是一部杰出的散文集。它以人物为表现中心,刻画了许多生动鲜活的人物形象。虽然,刻画的人物以纵横家居多,但与之相比,游侠单纯、可爱、豪爽、自由又不乏正义感的性格深深吸引着人们。

游侠产生于春秋战国分封制崩溃的时期,他们没有自己的土地,经济来源也不固定。因此,通常是靠技艺解人急难来生存,也不固定给谁当门客。他们独来独往,没有组织,也不愿受法律制度约束。

《战国策》记载,战国一著名游侠鲁仲连,曾经游历齐、赵各国,为齐国解燕围,为赵国解秦困,拯救了许多百姓生命,却不受封爵、财宝。鲁仲连自称士而非侠,可见,士与侠的界线似乎并不十分的明确。一个“忍”字,足见其诚恳真挚。这与之前一味追名逐利的纵横家相比,大家也是看得一目了然。那时社会“为一切之权”,什么仁义礼信之说,已完全被打破。面对那样的社会,游侠不愿苟同,他们游离于既定的文化规范之外,蔑视自己所处的社会文化和价值观念,因而,他们会采取极端抗拒行为,行动乖僻,有的甚至为世人所不解。

《战国策·燕三》中《燕太子丹质于秦》一文记载的是荆轲刺秦王的故事。太子丹逃回燕国,见秦要吞并六国,军队已逼近易水,他一心想灭秦保燕,但又一时无措。当他召见田光请教国事时,田光将荆轲介绍给太子丹认识。于是,太子丹请荆轲入秦刺杀秦王。荆轲慷慨激昂、义无反顾,和他的助手秦武阳来到了秦国大殿之上。秦武阳紧张得乱了阵脚,脸色大变。秦王起疑,幸而荆轲自若而答,说他是“北蛮夷之鄙人”,没见过大世面,机智巧妙地圆了

场,可这并未改变注定的悲剧。图穷匕见,荆轲手持匕首冲向秦王,秦王猝起不意,惊慌失措之中,连腰间的长剑瞬间也拔不出,被荆轲逼得环柱而走。千钧一发之际,秦王被左右提醒,才拔剑击荆轲,结束了搏斗。结果,荆轲自然是一个死。荆轲临死前“箕踞以骂曰:‘事所以不成者乃欲以生劫之,必得契约以报太子也。’”实际上,荆轲又何止“报太子”那么简单呢?那是完成他的人生追求,他们是在一次次交手中,完成自我价值的体现、人格的体现、侠义精神的体现。用今人的观点来看,也许会说,幸亏荆轲没成功,否则全民族的统一又不知得推迟多少年。当然,时代的局限,他不大可能认识到大一统的意义,最多只能意识到无辜百姓在战争中无端丧命的人道主义精神罢了。苏洵在《六国论》中说:“至丹以荆卿为计,始速祸焉。”“刺客不行,良将尤在。”这说的是燕国以用兵之效能延续国运,还应以用兵来抵抗秦国,不应让荆轲去行刺,让荆轲行刺反而使燕国的祸患更快地到来。

刺客对于历史的必然趋势是无力扭转的,所以靠荆轲来扭转不利局面也只能缓冲局势,即使成功,对于秦与燕的强弱对比并无改善。还是应该立足自己的自强来抵抗强敌,只可惜了荆轲的一片诚心。显然,荆轲被利用的成分更多些,不过,由于太子丹的私恨与他的国家的命运,乃至众国百姓性命相连,这样,荆轲的行为在当时也还算得上正义了。

再如《战国策》中记载的游侠豫让。豫让本是大门阀智伯的家臣,韩、赵、魏三家分晋后,赵家族长赵襄子恨透了智伯,灭了智伯并把他的头颅做成了酒器。豫让得知此事后,立志要为智伯报仇。我们知道,智伯其实也不是个正派人物。然而,豫让的执著令人惊叹,他策划刺杀赵襄子,结果被抓,赵襄子知道豫让报仇的原委后,被其忠义之心所感动,于是,又把他放了。可豫让仍然不死心,以漆涂身,又吞炭变声,最后连妻子都辨认不出。他二次刺杀,不料,又被赵襄子识破。这回赵襄子可不会再放过他了,问他死前还有什么要求。豫让竟说,只想刺赵襄子衣服几剑,以尽自己报恩智伯的心意。赵襄子便把衣服脱下来给他,豫让便连刺三剑,大呼“我为知伯报仇了”,便伏剑而死。

通过以上事例,我们不难发现,游侠似乎并不十分在乎事情本身的成功与否。荆轲高言,刺杀没成功是要活捉秦王,要秦王归还侵占燕国土地的凭证。豫让的报仇,最终也只是在仇人的许可之下,刺了几下衣服,便觉得大仇已报,心事已了。听起来的确荒唐,然而,他们为什么有如此举动呢?他们不在乎事情的成败,那么,只可能是在乎事情的意义了。

今人观之,在这一点上,不论是荆轲还是豫让都应该好好学学晋知罃,不卑不亢,不因楚王抓了他而怨恨,也不因楚王放了他而感激,更无所报答。不是他知恩不报,而是因为他洞悉了楚王的意图,不愿做楚王的棋子。

三、古往今来的游侠

司马迁较早为侠立传,并提出种种“侠”之概念。他的《史记·游侠列传》言:“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这段话为游侠鸣不平,同时对“侠”的内涵作了言简意赅的概括。按照司马迁对“侠”的定义和描述,那么古代人物中堪称侠士者是不不少的,像本受委派去刺赵盾却被赵的勤谨俭朴感动得自杀的杀手鉏麴,像排难解纷后飘然而去拒绝言功的鲁仲连,都够得上“侠”的称号。

司马迁的这个观点,富有启发性——我们的确不必把侠只看作某种特殊的人物,更不必一提“侠”字便只想到好勇斗狠之类。人性的内涵本来极为丰富,侠气或曰侠性乃是人性的一个侧面、一个部分,也和人性的其他内涵一样。自司马迁开始,一代代游离于正统以外的文人,在目睹人间种种不平时,总能从心底唤起同样的侠义之梦,与之相伴的是我们熟悉或不熟悉的侠客:红拂女、虬髯客、李靖、昆仑奴……

明人张潮说:“胸中有小不平,可以酒消之;世间大不平,惟剑不能消之。”就这么一说,却没有多少文人真的仗剑行侠。据说李白曾做过游侠,还杀过人——“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笑尽一杯酒,杀人都市中”等。当然,也就是据说了,实在是没什么可信度,不过是借以虚泛地表达心中的豪放之气罢了。

大概是游侠“身在法令外,纵逸常不禁”,冲决网罗,无所羁绊的狂放自由的精神吧,游侠以武乱禁,为不轨之正义,本就是一群以大勇之气击碎束缚规矩的血性男儿,以其独立不羁的个性,豪迈激切的情感,燃烧着生命的奔放与飞扬。文人吟颂游侠,以游侠自诩,正是他们心中同样涌动着渴望生命自由飞扬的冲动。

四、游侠精神分析

身逢乱世,游侠无从选择。入仕,他们讨厌朝秦暮楚,油嘴滑舌。因为他们正直,说一不二。归隐,男子汉大丈夫怎能做缩头乌龟。怎么办,没有选择的选择,游侠不是他们的选择,是时代给他们的定义,是历史给他们的符号,面对世态的种种,他们带着一丝无奈,夹着几分悲凉。这无奈、悲凉,就这么一点一点地积累着,一旦有机会,将会一齐宣泄,彻彻底底、完完全全、干干脆脆地宣泄,没什么能阻挡,付出生命他们也毫不吝惜。虽然来自社会下层,却以个人力量自下而上宣泄着抗暴精神。知道了这些,也就不难弄懂荆轲、豫让所在乎的意义所指出了。正如鲁仲连所言,游侠看中的是替人排忧解难而分文不取,他们在乱世中坚持着独立完整的人格,渴望人知,渴望认可,即使没人能了解,他们会用实践告诉世人。

造成游侠这种特殊人群的是那时的社会和文化。首先,周王室的衰微带来了社会的礼法崩溃。在不断战乱中最值得信赖的,最能保护自己的是个人所具备的能力,是

集信心、勇气、武力、判断力的综合能力。其次,战乱中,局势不明,各种势力都想不断壮大自己的力量,集纳人才,因此,游侠有了走上权力舞台的机会。再者,当时思想上的百家争鸣为游侠的产生做了某种思想上的准备。社会对于游侠,从行为上到思想上都给予很大的自由空间。游侠和墨家有莫大关系。鲁迅先生说:“孔子之徒为儒,墨子之徒为侠。”闻一多先生也说:“所谓侠者,不又是堕落了墨家吗?”“墨家失败了,一气愤,自由行动起来,产生所谓游侠了。”墨家是作为儒家的主要反对派出现的,其创始人墨子认为人与人之间应平等相处,不应有贵贱亲疏之别。游侠与墨家的关系,自来被认为是最密切的。墨家作为一个学术团体,他们所从事的是一般游士的共同事业:完成学业,然后四处游说,用自己的观点和辩才去影响诸侯各国,并争取出仕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以建功立业。然而,墨家却与侠的生长和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墨家对武侠现象进行了观察和研究,提出了完整的“任侠”观念和理论主张。《墨子·经上》曰:“任,士损己而益所为也。”注曰:“谓任侠。”这里墨子提出了一个重要的“任侠”

观念。他首先指出,任侠者出身于“士”阶层,武侠是“士”的一部分,这是指侠的社会性质。墨子还精粹地概括了“任侠”精神的实质和内核——“损己而益所为”,也就是损己利人。所以说,墨家与游侠,尤其对于游侠精神,性格的形成,有很大关系。

因此,游侠产生了。他们用生命诠释着自己的追求,证明着他们的反抗精神。他们身处底层不为人知的境遇,又进一步加深了游侠对世风的敌意和对抗。久之,则内心便会不断增长并到处蔓延渗透出孤独感,以及置身于一个敌对世界中的无能为力的绝望感,这便孕育了他们性格中的那份激烈,那种最原始也是最强大的生命力。那种拼死的攻击力,一旦爆发,便如火山喷发一般源源不断,直到终结。“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

后期游侠逐渐凝聚成社会群体,并显露出豪强的端倪。汉代,随着与朝廷矛盾的激化,加上官方不断负面宣传,侠从一种坎坷而潇洒的形象变成了破坏安宁、招灾惹祸的异端,远不同于《战国策》中的游侠那样的单纯而真挚。

[参考文献]

- [1]王廷栋,孙淑兰译,张清常审订.战国策全译[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
- [2]胡念贻.先秦文学论集·论《战国策》在文学上的成就[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3]刘向集录.战国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 [4]熊宪光.战国策研究[M].重庆:重庆出版社.
- [5]陈宏,张汪,陈千里.江湖[M].上海:百家出版社.

福州海上丝绸之路将申遗

海上丝绸之路是连接东西方文明的重要海上通道。福州海上丝绸之路绵延千年,为福建肇始。据悉,为了突出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地位,福州将联手国内7个古港城市申报世界文化遗产中国预备名单。2012年3月底,有关申遗材料将报送国家文物局。

自古以来,闽越人就“习于水斗、善于用舟”,发展到中唐逐渐融合为以汉族为主体的福建人,凭借着濒临台湾海峡的独特区域优势,发展海上经济贸易,福建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

与海上丝绸之路的形成发展相适应,福建沿海地区相继出现了享有盛誉的商贸中心——福州港(东冶港、甘棠港、邢港、乌猪港、太平港、新港等)、泉州港(刺桐港)、漳州港(月港)等,于唐五代、宋元、明清时期分别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其中,福州港具有肇始和奠定对外商贸格局、推动繁荣发展的作用。

福州海上丝绸之路萌芽于汉代。汉朝利用福州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和人民擅长航海的传统,开辟东冶港,作为对外交通和贸易的港口。“唐天宝年间,福州海上交通贸易成为朝廷发展对外文化交流和商贸往来的重要选择,从而使福州在唐代中期至五代期间,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港口城市和经济、文化中心,并与广州、扬州并列为唐代三大贸易港口。”

宋代,福州已成为当时海上丝绸之路贸易中丝绸的主产地之一。宋元时期,福州亦是重要贸易港口城市。明代,福州是全国重要造船基地之一。

专家认为,海上丝绸之路福州史迹遗存丰富多样、保存完好,为9~10世纪人类航海贸易史提供了独特的见证。福州作为中国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港口城市,自古生活在这里的原住民以舟为居,以楫为马,以海为田,具有深厚的海洋传统与特质。